

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

• 白魯恂

現代化對中國民族特性的挑戰

當「中國革命」進入第二個世紀之際，中國人和他們的領導者究竟在為自己塑造一個甚麼樣的民族國家呢？早期改革者對民族強大和現代化的嚮往以追求「富強」的面目出現，而這仍未曾改變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基本問題。確實，我們可以問，還有甚麼關於中國的課題比「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更陳腐呢？舊調重彈還可以有些甚麼新意？新意在於課題的迫切性，因為隨着共產主義的世界性危機加深，我們見到作為中國政權合法性基礎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正遭受無情侵蝕。可以預見，民族主義將會填補「信仰危機」與社會主義神話破產所造成的空白。如果中國的將來有賴於民族主義，那麼我們最好先清楚了解，在後馬克思列寧主義時代，中國民族主義將會有些甚麼特徵。更重要的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態會怎樣影響中國社會、政治的現代化前景？

我要論證的是，第一，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關係在中國與在其他地方是不相同的。其次，中國雖然歷史悠久，文化深厚，但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卻造成了一種相對來說鬆散和缺乏意識的民族主義。換言之，中國雖然產生了世界上最偉大的一個文明，並且仍然有牢固和雄厚的文化力量，但奇怪地，在現代它的民族主義卻是幼稚、空洞的。更奇怪的是，民族主義雖然空洞，中國的統治階層卻能利用愛國主義的呼召來壓制那些現代化最成功的中國人。對這些大題目，我會先作一般性討論，然後就海外中國人的經驗作論證。

可以預見，民族主義將會填補「信仰危機」與社會主義神話破產所造成的空白。如果中國的將來有賴於民族主義，那麼我們最好先清楚了解，在後馬克思列寧主義時代，中國民族主義將會有些甚麼特徵。

* 承蒙白魯恂教授同意，將他1991年1月9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偉倫講座上的演講論文，節譯為中文在本刊發表，謹表誠摯謝意。

兩個難以捉摸的主題

民族主義應該僅僅涉及那些與「民族國家」觀念相關聯的情感，但我們卻往往把它和與群體歸屬感有關的許多其他情緒相混淆了。現代化的本質是揉合地方文化價值與世界文化的普遍標準。但在流行觀念中，現代化同樣是西化、經濟發展和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等觀念的混雜。民族主義不應該混同於部落主義、種族主義，或者由於共同文化、宗教、語言產生的歸屬感：它只應包括那些對建立民族國家有基本重要性的情感和態度。民族主義不單只為人民對他們民族國家的忠誠提供基礎，而且界定了領袖的地位，並因此而規限他們的行為。民族主義的時代是隨近代民族國家體制的形成而來。它是一種近代的情感，是由人民對他們的原有國家，對原來整個國家制度的反感而產生的。所以傳統的「中國情結」(Middle Kingdom Complex)或者大漢族沙文主義都不應和中國民族主義混同。民族國家的建設經過告訴我們，原始的情感是不夠的，民族國家還必須有一組獨特的，與其政治體制密切相關的理想、渴望、神話、符號才成。

民族主義是一種近代的情感，傳統的「中國情結」或者大漢族沙文主義都不應和中國民族主義混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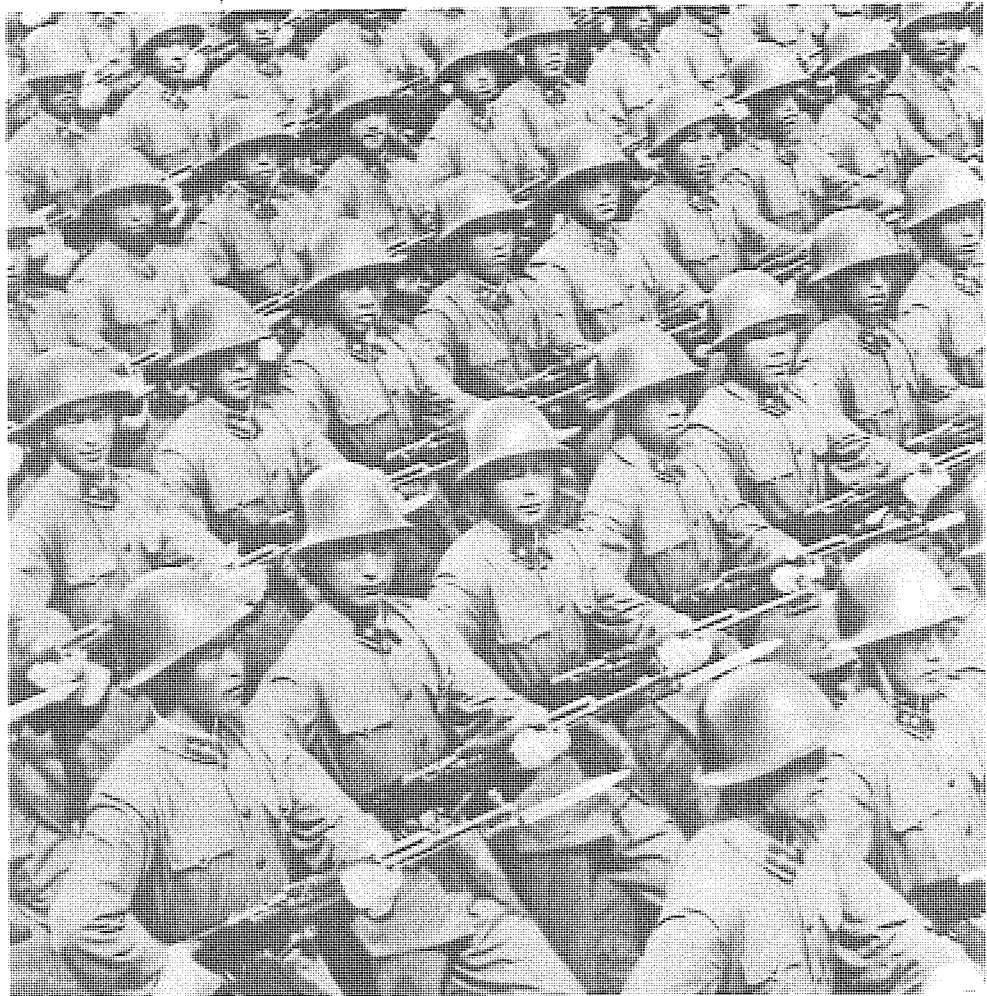


圖 認同民族主義跟認同政治黨派沒有必然關係，只對黨派忠誠，並不是真正民族主義的表現。

而且，民族主義的認同不能被政治黨派圍限。政治家自然努力把自己看作民族情感的對象，但如果一個領導團體認為，愛國主義就是支持他們黨派的立場，任何異黨分子都是不愛國的，那麼這只不過是政治動作，並不是真正民族主義的表現。

因此要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實質，就必須看到那些既有異於中國人的種族或文化歸屬感，又不同於對當時政策或領導所持態度的那些情感。最重要的是，要把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同一切與中國文化和種族主體相聯繫的強烈情感區分開來。當然，中國文化和種族的現實情況對於塑造中國人的政治行為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但要了解中國歷史的可能發展方向，我們還必須對能夠促進中國民族主義的那些理想、神話、符號有清楚了解。

不過，更為複雜的是，民族主義是一種不斷變化的情感。而且，歷史事件會激發情緒，從而深刻地改變民族意識的性格和內涵。因此，民族主義必定是與時代相呼應的。一旦出現了急劇的社會轉變或革命時，這社會會出現怎樣的民族主義便難以逆料了。革命固然可以像在法國那樣鞏固民族主義；但革命性轉變也可以產生迷惘、陷於幻滅、沒有甚麼民族主義可言的民衆，像在亞洲和非洲一些脫離了殖民統治的腐敗新興國家一樣。

現代化同樣也是一個難以捉摸的東西，和民族主義一樣，它也是在民族國家體制的創建過程中，在歐洲出現的，然後，隨着民族國家紛紛建立，它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起初現代化往往混同於西化，但是我們已愈來愈認識到，現代化是與國際規範、普遍的知識如科學技術等，以及先進的當代社會價值和實踐相聯繫的。就像民族主義一樣，現代化根本上也是一種態度。具體說，推動現代化的人，必須具備高度的自覺、開放的胸懷，和突破傳統僵化教條的能力。

民族主義和現代化之間的關係顯然是複雜的。它們既可以彼此強化，又可以彼此對抗。在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當中，地方性的、個別的傾向與世界性的、普遍的規範之間的張力經常存在。民族主義的構成肯定來自社會的歷史傳統和遺產，但它卻只有和其他民族國家拉上關係才有意義，因此它也是同世界性的規範相呼應的。現代化同樣地反映了世界性的價值和共同標準，但是倘若它想要站住腳跟，並成為一種有意義的力量，它還必須和個別社會的地方傳統產生共鳴。因此在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本身之中，便存在着社會的地方文化和世界性普遍規範之間的張力。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是建立民族國家和發展政治的兩種動力，但它們也可以相互對抗，使進步癱瘓。

在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本身之中，便存在着社會的地方文化和世界性普遍規範之間的張力。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是建立民族國家和發展政治的兩種動力，但它們也可以相互對抗，使進步癱瘓。

中國的獨特性

我們詳細地考察中國的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時，可以看出中國之一般模式不同也許有深層、基本的原因，所以應該對它作個別研究。在其他後殖民主義地區，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是相互加強的兩股力量；而在中國，二者本質上卻是相互對抗的。在別的地區，民族主義的闡明是靠國家中最具現代頭腦的人；獨

立自主和民族主義的理想是由西化的知識分子所鼓吹的。像尼赫魯、甘地、恩克魯瑪(Nkrumah)和蘇加諾這些南亞、東南亞和非洲的反殖民主義領袖，他們對現代世界和各自的傳統文化都非常熟悉。他們憑着個人經歷，充分洞悉傳統與現代社會結合時所產生的挑戰。

相反，中國的政治權力卻從來不掌握在最有學問和最現代化的人手中。在中國大陸，掌握最高政治實權的，大都是來自中國內地的人，當中沒有一個對現代世界有深刻的瞭解，也沒有一個會說外語。在別的國家，那些最現代化的人往往公認為民族主義理想的可靠發言人，但在中國他們一般卻被疑為不是真正的「中國人」。於是，從義和團運動到最近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國的政治階層一直把現代的、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國人看成是一群污染了、有缺陷、因此不配領導中國民族主義的人。

由於中國人以獨特的方式思考其文化遺產和現代化目標之間的關係，因此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了。和別國不一樣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往往對他們偉大的傳統文化持全面敵對態度，鼓吹全盤摒棄過去，毫不保留地接受西方文化。從七十多年前的五四運動，經過毛澤東主義的時代，再到《河殤》這部電視片集，中國文化遺產一再遭到抨擊。但當然，他們動機各異：對現代化前景的看法也不一致。而有時別的領導人，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則走到另一極端，試圖把中國的傳統理想化。但理想化的並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中國大眾文化，只不過是浪漫化的過去罷了。這樣，在全盤攻擊傳統文化和把過去浪漫化這兩個極端之間，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都一直不能像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一樣，通過結合傳統與現代文化而創造一種新的民族主義情感。

我認為中國這種有別於其他國家的發展，是由於中國人對西方的反應本來就極其獨特，跟受過歐洲殖民主義統治的大多數亞非國家根本不一樣。但是我們卻不能把二者的差異單純地歸結為：中國投向列寧主義的結果。其實，當中國最初與現代強大的民族國家相遇時，那獨特的環境已經埋下了差異的種子。我們說中國最初與西方的接觸引發了後來獨特的歷史，是因為它帶來獨一無二的通商口岸制度，這種制度大大推動了中國社會多方面的現代化，但也加深了中國地方與內陸的差別，從而使民族主義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更形緊張。

通商口岸和殖民地：一個基本差別

在中國沿海通商口岸發展出來的貿易管理和文化交往制度，與其他直接或間接受殖民主義統治的國家是大有差別的。但由於中國的各個領袖總是堅持，自二十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即受到和其他前亞非殖民地一樣的帝國主義壓迫，以上的差別就逐漸弄得模糊了。在其他國家，殖民統治包含很複雜的人際互動，推動現代化的當地人和殖民國家代表之間，有着直接和強烈的人際關係。例如，印度人便知道英國人是甚麼樣子的，因此殖民主義並不是抽象概念。這關係是一種極複雜的愛恨心理。另一方面，一般中國人和「帝國主義者」之間並沒有甚麼直接交往：對他們來說，所謂外國滲透的威脅和「不平等條約」

從義和團運動到最近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國的政治階層一直把現代的、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國人看成是一群污染了、有缺陷、因此不配領導中國民族主義的人。

通商口岸制度大大推動了中國社會多方面的現代化，但也加深了中國地方與內陸的差別，從而使民族主義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更形緊張。

的惡行，只是沒有體驗的抽象概念。

通商口岸制度的根本和深遠影響，在於十分具體和生動地證明了中國統治的軟弱和外國統治的明顯優勢。當中國內地廣大百姓飽受着無能、腐敗的軍閥政府折磨時，租界卻為中國人提供另一個環境，令他們能過優裕生活，並體驗現代生活精神。湧到租界生活的中國人毫無疑問地以行動表示他們認為外國統治優於中國統治。於是內地雖被視為真正的中國，但是一個殘破、丟臉的中國。對租界的中國人來說，當他們發展出民族意識的時候，便無法擺脫一種負罪感；而內地的中國人則在愈來愈感受到現代化的同時，感到恥辱和羞愧。

這和殖民地世界是完全不同的。那裏根本沒有這種內外政權之間的選擇，那裏的對比是存在於現實殖民統治以及烏托邦似的獨立這二者之間。因此，民族主義領袖可以結合歷史傳統的優秀遺產和西方先進文明來表達他們的理想；喚醒民衆的政治意識，正等於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結合。而殖民統治，特別是在後期，則有意識地讓政權自然地過渡到那些具有現代知識和技術的人手上。從印度到印度尼西亞，從緬甸到菲律賓，以及整個非洲，那些逐漸有了現代意識的人們也同時被公認為民族主義的鬥士。作為民族運動的政治領袖，以及作為一名受過訓練的現代公務員，成為兩種競爭吸引人材的途徑，但是這兩種渠道本質上是相互促進的，從而使得民族主義與現代化也並行不悖。誠然，這些掙脫殖民主義成長的國家大多無法把傳統文化和新的民族目標結合，所以碰到困難之後，就往往產生民族主義崩潰，部族主義宰制政治的結果。但這只是更加強了我們必須清楚區分真正的民族主義與原始感情這一點而已。

在中國，卻是通商口岸那環境產生了最成功的中國現代化社區，但那裏的民衆被視為背棄中國而選擇外族統治，因此他們無法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代表。所以，中國民族主義內在緊張的根源大體上可以追溯到通商口岸制度。這制度造成了推動國家現代化的沿海租界文化，與及自認為是「真正中國」的中國內陸，兩者之間的分化。這深刻的分化產生極重要的後果，即確定了甚麼樣的事情才可名正言順地稱為民族主義；並加深了幾十年來人們對現代國際文化會危及中國民族精神的疑慮。它助長了這麼一個觀念：聰明、西化的中國人恐怕是不大愛國的，因此比起中國內陸的鄉土人士，他們算不上真正國家代表。不幸的是，這種觀念其實都是建立在對租界生活的嚴重誤解之上的。

中國民族主義內在緊張的根源大體上可以追溯到通商口岸制度。這制度造成了推動國家現代化的沿海租界文化，與及自認為是「真正中國」的中國內陸，兩者之間的分化。

被污蔑的口岸華人

可以理解，中國人為了表達他們的羞憤之情，將通商口岸描繪成骯髒、墮落的城市——如共產黨確信，是需要全盤清洗，以回復內地生活標準的地方。通商口岸的華人被描繪成受飢挨餓的乞丐或十足的浪蕩公子，成天泡在妓院和夜總會裏。假如一般公佈的妓女數字是準確的話，那等於說每十個上海女性中就有一個妓女。上海確實有盤根錯節的罪惡黑社會，例如惡名昭張，甚至影響深入政界的青幫。但像韋克曼(Frederic Wakeman)指出，這部分是從販毒而來的，正如販私酒在芝加哥所造成的問題一樣。



左派觀念中的通商口岸主要是從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教條來的，根據這教條，國際帝國主義宰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圖為上海租界時代派發的「打倒英帝國主義走狗孫傳芳」的單張。

一般認為，洋人在中國稱王稱霸，這只有洋人的租界形像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上海和從天津到廣東那些其他較小的通商口岸，其實都是中國人的城市。

一般認為，洋人在中國稱王稱霸，因此他們同當地人似乎沒有甚麼交往。這種「只容洋人」的神話忽視了中國最大的一批專業人士，包括許多記者、作家、律師、學者、醫生，更不用說商人和銀行家了。這只有洋人的租界形像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上海和從天津到廣東那些其他較小的通商口岸，其實都是中國人的城市。實際上，左派觀念中的通商口岸主要是從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教條來的。根據這教條，國際帝國主義宰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民族資產階級只是軟弱無力的配角。今日馬克思列寧主義已失去說服力，研究中國的發展也不應再以之為指導思想了。

由於上述神話和半真半假的說法，許多人已經忘記——或至根不知道，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上海乃是整個亞洲最繁華和國際化的大都會。上海的顯赫不僅在於在國際金融和貿易；在藝術和文化領域，上海也遠居其他一切亞洲城市之上。當時東京被掌握在迷頭迷腦的軍國主義者手中；馬尼拉像個美國鄉村俱樂部；巴塔維亞、河內、新加坡和仰光則只不過是些殖民地行政機構中心；只有加爾各答才有一點文化氣息，但卻仍遠遠落後於上海。

因此，認為通商口岸乃是外國力量的產物是錯誤的。上海的傑出成就，正

如香港戰後類似的驚人成就一樣，可以說幾乎全部由勤勞、有創造力和稟賦的中國中產階級造成。正如貝芝耶(Marie-Claire Bergere)多年來論證的，正是在上海，中國才開始成為「現代的學徒」，並且在1900-30年間，創造了一種新的，由日益增長的中產階級組成的「沿海文明」^①。在兩次大戰期間，一個「繁榮的國際都會在上海勃興，它是一個新的中國社會，因為顯然上海是中國人的」。商務和經濟活動是主要動力，這些活動造就了「新一代商業和工業家」。然而，正如貝芝耶所指出，在內地「只有無政府主義才能與正統勢力競爭」；在上海「世界文明的橋頭堡也是非正統中國的前哨，而對中國來說，現代化只是最新的異端」^②。

在上海的洋人從沒有傳說的那麼多。只是在口岸華人成功地創建現代化社會之後，外國人才漸漸多起來。1865年，法租界有55,465個中國人，而外國人只有460人^③。上海在30年代變成了避難大本營，它的外籍人口達到頂點，那也還是不足萬人。與這些外國人一起住在國際租界和法租界的，則有將近150萬中國人；在周圍市區，更有400萬中國人。

雖然在通商口岸的租界裏，最高行政權力由外國人掌管，但日常事務的實際管理大半還是抓在中國人手中。直至1875年，法租界的行政機關只有23個法國人；到1930年，在上海，控制着大半由中國人任職的公務機構的英國行政和警察官員還不到500人；在法租界內，法國行政人員大概只在100到150人之間。在其他通商口岸，中國公務人員在日常事務管理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當時的上海中國人已經自成社會，並發展出一種獨特的現代中國的生活方式。它的許多中產階級家庭培養出在現代社會感到自如但又了解中國傳統的下一代，由是而形成了一種獨特有力的上海文化。正如潘琳(Lynn Pan)所指出，只有這種文化才能培育像在中國出生的王安、貝聿銘和在國外的上海家庭出生的馬友友那樣的傑出人物^④。那時在中國大概沒有第二個地方是像法租界一樣，有那麼多中國家庭住在單獨的洋房裏過中產階級生活的。

我完全無意忽視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衝擊，或者粉刷西方政府(在上海)的作為。我要說的是，沿海發展了一個能從容自如地和西方打交道的現代中國人社區，而這是中國人應該感到自豪的。我這樣說，是充分了解一般人總是認為口岸華人沒有歷史重要性，或用托尼(R.H. Tawney)的話來說，是「縫接在古服邊上的緣飾」^⑤。像莫菲(Rhoads Murphey)所大力鼓吹的普遍觀點是通商口岸是「失敗」，中國內陸「成功地」擊退了西方，毛澤東證明了農民才是國家的真正希望^⑥。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自然會認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危機在於外力入侵和帝國主義威脅。但這是假如關鍵問題的話，那麼應該說，在通商口岸崛起的華人中產階層實際上是最能有效抵抗「帝國主義」的：這些社區有才華的民眾證明中國人可以對付「國際資本主義」，並且在這些現代活動中顯示能力，遏止威脅。事實上，他們戰前所致力也正就是戰後中國人在台灣、新加坡和香港所做的同樣事情。

上海人不僅僅創造了新的生活方式，他們還為許多重要工業部門立下堅實的基礎。在民國時期，從1927年起至1937年日本佔領上海為止，南京政府不斷壓榨上海資本家^⑦。在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上海作為經濟巨人和政治侏儒的

認為通商口岸乃是外國力量的產物是錯誤的。上海的傑出成就，正如香港戰後類似的驚人成就一樣，可以說幾乎全部由勤勞、有創造力和稟賦的中國中產階級造成。

應該說，在通商口岸崛起的華人中產階層實際上是最能有效抵抗「帝國主義」的：這些社區有才華的民眾證明中國人可以對付「國際資本主義」，並且在這些現代活動中顯示能力，遏止威脅。

現象仍然繼續。儘管大批流亡資本家離開上海，到香港協助創造經濟奇蹟，但他們所創造的上海經濟仍然是中國經濟的火車頭。四十多年來，上海一直是共和國技術、行政和外交人才的主要來源。它向全國輸出了兩百萬最有才能的人，但在共和國最初十年，仍向中央政府提供了一半的財政資金。直到1985年，上海仍一直遭受剝削，必須向上繳年收入的85-86%^⑧。在這四十年間，上海的資產基本上沒有擴大，但它卻有力足以支援中國其他地區。想來以前竟曾認為在上海所發生的是剝削中國，那真太可笑了。假如那是剝削，可惜中國沒有更多那樣的事。當前北京領導人也許正在考慮重新協助上海恢復領導地位，使它能同廣東競爭。

回過頭來看，那些才華橫溢、事業成功的沿海中國人弄得那麼自卑，自認是假洋鬼子，那真太奇怪了。更糟糕的是，他們竟然相信，只有順從那來自內地，眼光狹隘的政治領導層，才能顯明他們是真正的、忠誠的中國人。有成就的企業家和工業家於是生出不關心政治的心態，專心於私人企業，對國家大事敬而遠之。結果這些口岸華人的社會和經濟成就受到限制：他們不能產生代表社會利益、制衡政治領袖的機構，而中國連市民社會的初步也沒有發展起來。

儘管口岸華人在本身的現代化是成功的，但是他們卻無法為國家建立多元化市民社會的基礎。對創立新的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他們也同樣無能為力。

知識分子的反叛

儘管口岸華人在本身的現代化是成功的，但是他們卻無法為國家建立多元化市民社會的基礎。對創立新的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他們也同樣無能為力。這



圖 許多左翼作家的作品中，代表帝國主義的洋人總是神通廣大而又心狠手辣，而工人和農民則深受壓迫。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一大批現代知識分子，主要是作家，接受了半列寧主義觀點，把通商口岸看成國際資本主義的罪惡工程。

大多數這樣的作家對傳統中國文化和租界中最現代化的華人生活方式都採取強烈抵制態度。他們只要抨擊中國傳統家庭體制的一些特徵，例如包辦婚姻、妾侍制度和父權至上等，便輕易成為現代激進思想家：同時他們又醜化中國沿海的中產階級社會。幾乎所有這些作家都曾在上海或外國租界住過，因此他們又曾以行動選擇外國統治。結果，他們似乎為叛離中國文化而感到深切內疚和羞愧。所以現代化對他們來說是相當頭痛的事：他們的行為說明所謂帝國主義比中國政府統治要更有吸引力。為了減輕負罪感，他們不得不攻擊一切與「帝國主義」有關的東西，讚揚苦難工農的革命精神。共產黨創辦人李大釗教導他學生的話是知識分子大眾主義的典型：他說：「要離開城市和大學的『腐敗生活』，『到鄉村去』，到鄉村真正的人的生活中去」^⑨。

許多左翼作家對那些最有作為的租界華人所創造的文化嗤之以鼻，儘管他們清楚，那個世界要比他們自己常常美化的內地農民世界好得多。他們的作品中，代表帝國主義的洋人總是神通廣大而又心狠手辣。此外也有一些陷於紙醉金迷的洋人生活的中國走狗，當然也有一些道德高尚而又深受壓迫的工人和農民。皮克威茨(Paul G. Pickowicz)曾研究過當時一些最流行的電影，發現它們都如出一轍，攻擊那些最現代化的華人的道德品質^⑩。《桃花泣血記》純粹是一齣道德劇，它描寫一個富裕的城市男孩愛上了一位窮苦、善良的農民姑娘。他把她帶到城市，答應跟她結婚，但她懷孕之後，男孩的家庭開始反對這樁婚姻，而姑娘的父親也將她帶回農村，在那裏，她終於死於難產。皮克威茨評論說：「這個絕望的少女就是中國。她天真無邪的美麗是自然的……那位花花公

許多左翼作家對那些最有作為的租界華人所創造的文化嗤之以鼻，儘管他們清楚，那個世界要比他們自己常常美化的內地農民世界好得多。



當時最流行的電影都如出一轍：攻擊那些最現代化華人的道德品質。圖為電影《桃花泣血記》的劇照。

子發現了她的中國式美德以及絕代姿容。……但最後，他引誘她，奪去了她的貞操」^①。

在《粉紅色的夢》一片中，一位作家成了上海生活墮落的一個事例。他的妻子乃是一位純潔善良的農村姑娘、一位賢妻良母，可是這位作家卻「迷上了上海花花綠綠的世界」。他碰到一位妖艷的酒吧女郎，她「塗脂抹粉，抽煙喝酒，在西方的音樂聲中扭動腰肢，穿的則是袒胸露乳的新潮時裝」。作家陷入了情網，他拋棄妻子，妻子「孑然一身，奔走在寒冷而又飛雪的大街上」^②。但結果那位酒吧女郎玩膩了，又回到她的夜生活，投入另一位情人的懷抱。最終，還是他的前妻「拋棄前嫌，原諒了他」，拯救了這位作家。

在《體育皇后》一片中，一位來自農民家庭的姑娘被送到一所特殊的學校接受體育訓練，在那裏，她很快因為賽跑屢屢奪魁而紅得發紫。「她得意起來，忘掉了學習，塗脂抹粉，穿時髦服裝，開始同那些西化院校中的花花公子廝混在一起，而那些公子哥兒好像整天都在抽煙，喝酒，跳舞，性交。」可是，「當她看到一個同學在一場聲嘶力竭的比賽中死於非命的時候，她感到了追求個人的榮華乃是一樁大錯，於是她放棄了「田徑女王」的桂冠，決心作一名普通的體育教師來為他人服務」^③。

還有別的电影，像《小天使》等，也是重複同樣的主題，宣揚口岸華人的罪惡，說他們受到西方精神污染。相反。中國內地卻被描繪成充滿了高尚純樸和美德的地方。早在人民共和國簡單地作黑白劃分之前，毛時代的清教徒思想和雷鋒式的道德就已經由那些左派，主要是共產主義的电影工業完整地建立起來了。當然在一切工業化國家，也有那種宣揚鄉土的「傳統價值」而把城市視為罪惡之源的傾向，但30年代的中國人由於通商口岸問題成為現代化焦點，因而把這種傾向誇大到荒謬程度。通過這個事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問題多麼令人頭痛：儘管中國的道德傳統離不開孔子的中庸之道，但在這個方面他們卻走到極端。他們對口岸現代生活方式的攻擊是可以無限誇大的。

這些左翼作家和電影製片商抹煞了口岸華人的成就，但對塑造中國民族主義精神，又提不出自己的主張來。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的承擔使他們自然地成為列寧主義的信徒。日本入侵之後，大多數與共產主義者認同的知識分子心理上已準備接受毛澤東在「延安座談會」上的講話。在那次講話中，毛毫不含糊地指出，知識分子應該服從黨的領導，而不應追求個人創造性。劉賓雁曾描述過他入黨之後的第一感受：人們要他認清，「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的個人主義是「原罪」，因此他應該拒斥租界所代表的一切^④。

這裏不必細說中國知識分子在1949年後如何喪失喉舌的悲劇了。從1958年反右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最近對「精神污染」的攻擊，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俯首於對中國沿海以及它的價值持敵對態度的民族主義之前。

中國價值和外國知識

當然，左翼作家的悲慘命運並不是中國知識分子遭遇的全部，因為知識分

左翼作家和電影製片商抹煞了口岸華人的成就，但對塑造中國民族主義精神，又提不出自己的主張來。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的承擔使他們自然地成為列寧主義的信徒。



科技對建設富強中國的重要性一再被強調。可是，那些作為民族主義守護神的政治領導卻又輕易地抹煞了這些現代科技層人員的影響力。圖為中國著名的第一代領導人。

子中還有一些具有外國技術知識，或受過現代科學訓練。從1898年的改良運動，到五四運動，再到毛以後的四個現代化運動，科技對建設富強中國的重要性一再被強調。在其他殖民地國家，也許亦正是這一主題把民族主義和現代化聯繫起來的。可是，那些作為民族主義守護神的政治領導卻又輕易地抹煞了這些現代科技層人員的影響力。

這種把專門學識非政治化的公式，在早期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中就已經打下基礎了。這體用之分削弱了受過技術訓練者的政治力量。在這公式中，有專門知識的人應該把權威讓給能闡釋中國價值的發言人。於是年輕人受鼓勵學習西方科技，卻又須對宣揚中國價值的人唯命是從。這樣現代化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張力便制度化了。

同時，任何想要使中國民族主義從形式和內容上現代化的努力都給戴上緊箍咒。所謂體用的說法把中國的價值看成是本質，因此它應該受到保護，不受任何形式的玷污。結果體用之分也等於把所謂「中國」關進僵化正統模式之中：它不僅沒有促進改造中國價值以使之配合時代的動態過程，反而令「中國的」價值成為化石。

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大的諷刺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竟能夠把這個公式倒

新的體一用公式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取代儒家價值而成為「核心」。結果佔據中心的仍是一個僵化的正統模式。更糟糕的是，這核心變成只是一個政黨的立場。

把當今中國民族主義與其他民族主義相比較，便可以看出它是多麼的單薄。中國民族主義並沒有甚麼可以和美國民族主義的神聖象徵相比。

轉，但仍然保持反現代的偏見。儒家的倫理價值，即早期改革者奉為中國之「本」的，現在讓舶來品馬列主義取代，它可以用科學和技術加強，但卻不應任由其他外國或者現代價值污染。毛創造了一種有選擇和靈活地處理中國傳統文化的新方式。他攻擊大部分中國傳統文化是封建「殘餘」，但也承認其中有些成分應加以保留，但除了讚揚農民生活之外，他從來沒有說清楚甚麼是應該保留的。

這樣，新的體一用公式便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取代儒家價值而成為「核心」。結果佔據中心的仍是一個僵化的正統模式。更糟糕的是，這核心變成只是一個政黨的立場。除了作為黨派運動口號之外，它甚至沒有任何可以成為民族主義基礎的說法。結果，隨着時間推移，體用公式反倒成為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民族主義的絆腳石。把作為「體」的中國價值同作為用的現代知識區分開來的觀念，對整合鄉土文化和都市文明是起反作用的。然而這樣的整合對任何有效的現代民族主義來說，絕對是不可少的。這公式的倡導者把某些作為「國粹」和根本的價值封藏使之不受污染，實際上卻是要使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僵化，成為停滯的正統思想，把民族主義所應有的活力和生機剝奪殆盡。

四十年來在民族主義的名義下，不斷攻擊傳統中國文化，不斷箝制不容於當局的現代思想，使得中國民族主義只剩下一個空殼，一個教人說不出內容的空殼。中國人生活和培養下一代的方式當然仍在延續，但那種可以用有意義的符號和神話來一貫表示的集體理想和共同靈感卻已盪然無存。民族主義的種族基礎，即以洋人為「外人」，中國人為「自己人」的觀念至今原封不動，但是中國卻並沒有甚麼文化理想可以為它的民族主義注入實質內容。

民族主義的發展必須超越種族或民族歸屬的要求，而必須有實質內容去激發大眾感情以及設定規範和準則，限制領導者的行為。我們把當今中國民族主義與其他民族主義相比較，便可以看出它是多麼的單薄。中國民族主義並沒有甚麼可以和美國民族主義的神聖象徵，像獨立宣言、憲法、人權宣言，和亨廷頓(Sammuel P. Huntington)所說的美國信條這一整套價值體制(根據這套價值就可以視某些行為為「非美國」)相比。同樣，它似乎也拿不出和英國人對君主政體、議會和那整套行為常規(這常規使得殖民地人民，例如印度人，可以指控他們的英國主人沒有按照英國理想辦事)的尊重對策的東西來。

中國領導人鼓吹「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卻說不出究竟有那些特色，這進一步顯明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空洞。在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官方雜誌發表過一篇重要社論，它對愛國主義下了一個官方定義，說如果要愛國，那就要愛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然而，任何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都不應當簡單地歸結為對一個政黨的忠誠，或現時的政策傾向。帶有「神話」和符號的民族主義理想應該有自己的範疇，超然於當前政策綱領的舞台之上。

尋求新的歸屬感

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它種種體用公式本來被認為可以為確定中國民族

主義本質，為接受某些現代化特徵提供基礎，但是如今卻出現了愈來愈嚴重的危機。這公式一度好像可以為求民族發展和實現現代化兩方面提供客觀、直接的途徑，並且令中國人在社會變遷中避免遭遇其他民族常遭遇到的心理混亂。吊詭的是，以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有基本矛盾為特徵的中國，直至現在卻還很少由於現代化而產生的主觀或心理壓力。在前殖民地國家，一般人則掙扎於兩種文化之間，自覺失去根本。中國人沒有感到這個問題，因為直到幾年之前，中國令人肅然的偉大文化的殘餘，還足以使無論內地或沿海的大多數中國人覺得這不需要討論。

鄧小平的改革在80年代末期陷入困境，大家愈來愈關注「精神危機」，這自然是文化大革命所產生的懷疑態度造成的。《河殤》所引起的廣泛和熱烈的反響，令政府不得不出面抨擊它的歷史虛無主義。從這兩個事實可以看出，許多中國人已經開始在靈魂深處探索民族歸屬感和現代化含義的問題了。

因此，有迹象表明，一些有思想的中國人開始意識到真正探討中國人集體歸屬感的需要。從歷史和民族考慮出發，他們要分清誰是集體的「我們」，誰是「他們」，並沒有困難。然而，在確定民族身分的第一步邁出之後，困難便隨之而來，因為這麼多年來，中國的文化遺產一直遭受殘酷打擊。而且，那些在創造近代文明有成就的中國人也一直被抨擊為不愛國。現在內地貶抑沿海的思想方式已不再受重視，馬克思主義也不再被看成走在歷史的前緣了，中國民族主義的黨內代言人因此也不知該到那裏去尋找新的民族主義本質。目前的政權已經再無法從中國偉大文化傳統的殘餘中發掘到甚麼東西，以表達中國民族主義新精神的理想了。愛國主義則只剩下了對現存領導和政策的盲目忠誠。

這問題是相當嚴重的，因為中國繼續推行現代化時，需要富於啟發性的民族主義力量。就像麥法考(Roderick MacFarquhar)所說，領導階層似乎正在準備把目標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轉向「建設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但是中國並沒有建立整體民族主義的材料，因為它文化的集體符號和理想已遭受了如此深重的傷害。摒棄戰前沿海地區揉合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的做法，和轉向以列寧主義為本的假民族主義，使中國既不能現代化，也得不到民族自尊。

我們對以增訂正宗傳統文化來填補上述空白不能寄以厚望。李光耀在他總理任內最後幾年企圖在星加坡推行儒家價值觀，以平衡他一生建立現代、俗世化、科技化社會的努力。因此星加坡的榜樣大概會使得尋找現代民族主義理想的重心從戰前租界轉到當今海外華人社會。我恐怕結果是一方面對中國人的現代化成績給予高度評價，另一方面卻要在把這些成績轉化為實質的中國民族主義時，如以前一樣，遇到極深刻的困難。

現在內地貶抑沿海的思想方式已不再受重視，馬克思主義也不再被看成走在歷史的前緣了，中國民族主義的黨內代言人因此也不知該到那裏去尋找新的民族主義本質。

註釋

- ① 見Bergere的著作，如“‘The Other China’: Shanghai from 1919 to 1949”載於Christopher Howe (ed), *Shangha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引文見*China Quarterly*, 122, June 1990, p. 318.

- ② Bergere, in Howe *op. cit.*, pp. 9, 13, 14.
- ③⑧ Betty Peh-t's Wei: *Shanghai: Crucible of Moder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P, 1987), pp. 67-8; p. 266.
- ④ Lynn Pan: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Boston: Little Brown, 1990) pp. 281-2.
- ⑤ R.H. Tawney: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London, 1932), 頁13, 轉引自Rhoads Murphey, *The Outsiders: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p. 1
- ⑥ 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What went wro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1970).
- ⑦ 史學界對國民黨政府和上海資本家之間的關係一直有爭論，一般左派分子看重二者的聯盟，另一些人則看作一種極複雜的關係，即自主國家為自身權益而壓榨資本家。庫伯爾(Parks M. Coble)說：「兩個集團間的關係有這些特徵：政府努力削弱都市資本家並極力壓榨這個現代經濟陣地。南京政策所關心的是國家全年收入，並非資本家的福利和經濟發展的可能性，資本家一直在政治上被壓抑，到了1937年，簡直成為政府附庸。」見他的*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nking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6), p. 3.
- ⑨ Maurice Meisner: "Leninism and Maoism: Some Populist Perspectives on Marxism-Leninism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45 (1971) p. 17, 轉引自Murphey, *The Outsiders, op. cit.*, p. 229.
- ⑩⑪⑫⑬ Paul G. Pickowicz: "The Theme of Spiritual Pollution in Chinese Films of the 1930s" *Modern China*, Vol. 17, No. 1, Jan 1991, pp. 38-75; p. 43; p. 46; p. 50.
- ⑭ 劉賓雁：《高度的忠誠》(紐約：1990)2章。

林雅 譯
羅奇 校訂

白魯恂(Lucian W. Pye) 是美國當代著名的政治學家，對比較政治學，特別是現代化過程在傳統亞洲社會所造成的衝擊有深刻研究和獨到見解。白教授1921年出生於中國山西，40至50年代間先後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1956年出任麻省理工學院教職，1972年任福特政治學講座教授，以迄於今。白教授著作等身，專書即達十三種，最重要的俱以中國現代政治為題材，包括*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 (1988), *The Dynamics of Factions and Concensus in Chinese Politics* (1981),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1976)等。白教授曾榮膺美國藝文與科學學院院士，並出任1988-89年度美國政治學學會會長。